

## 读史札记

# “朱批记载”考

刘文华

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发生的太监高云从案是乾隆朝中期的一件大事，被视为乾隆帝严密防范太监干政的典型案件。此案起因于兵部侍郎高朴觐见时提及“风闻内监中有将记名人员朱批记载泄露外廷之事”，乾隆帝听闻后追问，得知与“管理记载身材矮小之内监”有关。据高朴称，他是偶然听到左都御史观保、户部右侍郎蒋赐棨、刑部右侍郎吴坛在九卿班上谈论道府记载优劣。于是乾隆帝先将管理记载的太监高云从撤往别处当差，然后亲自审讯高云从。据高云从交代，军机大臣于敏中、刑部右侍郎吴坛等都向他打听过道府记载。进一步的调查发现，高云从不仅泄露了道府记载，还交结内外官员，为其兄弟请托谋职。乾隆帝震怒，下令彻查此事，多名官员牵涉其中，最后高云从处斩，于敏中革职留任，观保、蒋赐棨、吴坛等亦革职查办。<sup>①</sup>二十年后，乾隆帝仍对于敏中交结内监，探听朱批记载一事耿耿于怀，借国史馆进呈《于敏中传》之机，下旨痛斥，并将其孙于德裕承袭的轻车都尉世职撤革。<sup>②</sup>由此可见乾隆帝对于朱批记载的重视。

那么，什么是道府记载、朱批记载，档案中有没有相关实例，朱批记载怎样产生，如何管理运用，朱批记载对官员仕途有什么影响，学界对于这些问题都尚未有深入研究，笔者拟发掘宫中朱批及请安折档案，结合典章记载并清人日记笔记等，对此加以探讨。

## 一、何为朱批记载

高云从泄漏的“道府记载”，有研究者认为“是皇帝对各省道府官员的姓名及其治行优绌的记录，以此作为官员升迁时的参考，其内容除皇帝之外不许他人窥视。”<sup>③</sup>“道府记载”确实是作为官员升迁时的参考，并且严格保密，不容外人阅看。但是，“道府记载”是“皇帝对各省道府官员的姓名及其治行优绌的记录”这个论断，并不够准确。

查考清代档案可知，“道府记载”是朱批记载的一种。因朱批记载由皇帝秘记，专人归档保管，严格保密，除非皇帝宣示，外人一般不得而知，因此，典籍中很少留下有关朱批记载的记录。笔者经过寻绎，在上谕档中发现有三条相关记录，涉及朱批记载的产生与运用，简述如下。

[收稿日期] 2016-06-23

[作者简介] 刘文华（1985-），男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，任职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北京 100031；batynuno@sohu.com

①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963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甲戌、己卯。

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，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第1条。以下所引档案皆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。

③ 王虹《清“高云从案”考实》，《云南教育学院学报》1989年第3期。

乾隆四十一年，陕甘总督勒尔谨奏称，延绥镇总兵三德、宁夏镇总兵裴慎奏准陛见，却都没有等待委署之员接任，就将总兵印务交付中军游击，然后起程。勒尔谨认为两人未谙体制，似于总兵不甚相宜，请求改予内用。乾隆帝认为勒尔谨“所奏甚谬”，于是特意寄谕教导勒尔谨。寄谕中称，三德、裴慎不待委员接印即行起程，只不过是急于陛见，称不上大过，确实可以说是不谙体制。但是，勒尔谨因此认为他们不宜担任总兵，却实在是过分了。如果他们回任后有贻误营务的地方，勒尔谨不妨据实具奏请予内用，但不应预存成见，预料他们不能胜任。而且三德、裴慎在军营都颇为出力，是以擢用总兵。乾隆帝谕旨还说他们“昨来行在陛见召对时，视其材具器识均尚可胜总兵之任，密为记载。着将原片二件封发勒尔谨阅看，令其阅毕仍即缴回，俾知朕与总兵等之是否相宜一经召见，无不密记以备考核，文职道府以上亦然。总因人才难得，故时刻留心，冀备任使。朕于用人之道慎重若此。勒尔谨身任封疆，岂可不为国家爱惜人才乎。”<sup>①</sup> 陕甘总督勒尔谨认为三德、裴慎不适合担任总兵，但乾隆帝召见后觉得两人能够胜任总兵，将此评断朱笔记载。为了使勒尔谨明了自己留意人才，慎重用人的苦心，并促使勒尔谨也“为国家爱惜人才”，乾隆帝就将朱批记载的原片发予勒尔谨阅看，看完即刻缴回。勒尔谨接到寄谕和朱笔记载后，诚惶诚恐，恭维皇帝说“兹捧读圣训暨朱笔记载，仰见我皇上至圣至明，凡蒙召见，无不洞烛隐微。”<sup>②</sup>

乾隆五十年，河南巡抚毕沅上奏，认为归德知府穆克登泰初次担任地方官职，不谙习河工事务，乾隆帝寄谕称“本日行在吏部将穆克登泰带领引见，朕看该员不过一诚实本分之人，复查阅该府从前请训时记载，亦不过注其谨飭。毕沅所奏甚属公正。……归德一府不特滨临黄河，非穆克登泰之不谙河务者所能胜任，且所属州县与江南接壤毗连，人多巧诈，朕素悉该处繁剧难治，穆克登泰才具中平，即于地方事务办理亦恐致竭蹶。”所以将穆克登泰开缺他用。<sup>③</sup> 河南巡抚毕沅奏称归德知府穆克登泰不谙习河务，乾隆帝召见其人时觉得才具中平，又查阅其以前请训召见时的朱批记载是“谨飭”，更加确认此评价。因毕沅的评价“甚属公正”，于是特意寄谕毕沅予以褒扬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，安徽巡抚书麟奏保庐州知府钱金殿堪任道员，乾隆帝召见时“见其才具只属中平，且觉年老”，于是“检阅该员向年记载，系二等知府，并非出色之员”。乾隆帝寄谕书麟，指斥道“该员前于江安粮道任内因公降调，补授徐州府知府，经该督抚奏调太平府简缺，复由太平调任庐州府。庐州虽在安省为中繁缺分，较之徐州，已属事简，何以转将该员保奏？前降旨令各督抚特保道府，原欲伊等于属员中察其才具出众，实能胜冲繁要缺、谙练地方事务者，秉公保列，以备简用，今钱金殿不过中材，又加以年老，若似此循分供职之员，各部院京察记名人员内较为优胜者正不乏人，又何须该抚特登荐劾耶！”乾隆帝命令“传谕书麟将因何保奏之处据实覆奏，或朕于引见时看其才具中平，而该员在安省实有何事办理出力，该抚因将该员特行保奏之处，亦著书麟一并核实具奏，固不可意存回护，亦不必因有此旨稍为迁就，以致屈抑人材，所有记载原片并着发交书麟阅看，遇便缴还。”<sup>④</sup> 安徽巡抚书麟保荐庐州知府钱金殿，乾隆帝召见后发现其才具中平且年纪太老，于是检阅钱金殿以前召见时的朱批记载，发现评价也只是一般。于是指斥书麟，并要求他将保奏原因据实复奏。同时，将有朱批记载的原片发予书麟阅看，看完后便缴还。

通过以上三条记录，我们发现有一共同之处就是所提及的记载都是产生于召见引见之时

① 军机处上谕档，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五日第2条。

② 陕甘总督勒尔谨《奏为钦奉训谕谢恩并恭缴朱笔记载事》，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五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6-0065-058。此折承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刚惠示。

③ 军机处上谕档，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一日第2条。

④ 军机处上谕档，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第1条。

(请训亦召见)。乾隆帝有关总兵三德、裴慎,知府穆克登泰的朱批记载,在清宫档案中未能查找到,不过有关知府钱金殿的却有三件。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初八日,时任江宁知府的钱金殿大计卓异引见,奉旨准其卓异加一级回任,上谢恩折被召见,乾隆帝在其名字左边朱批“道员似可,再上恐未能”<sup>①</sup>。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,江安粮道钱金殿因事降调,奉旨仍发往江苏以知府用,上谢恩折,乾隆帝召见后朱批“老吏,只可府道材”<sup>②</sup>。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钱金殿奉旨回任庐州知府上谢恩折,也就是前引皇帝召见钱金殿的那次,乾隆帝朱批“妥当而已”<sup>③</sup>。乾隆帝所称的有关知府钱金殿的“向年记载”就是乾隆三十八、四十七年两次谢恩折上的朱批评语,评价确实只是一般。

通过上谕档中的记载,尤其是有关钱金殿的三件奏折实例,我们已能对朱批记载有了初步认识。笔者在宫中全宗档案中查找到了几件明确标明“布政记载”、“总兵记载”的档案,更能说明问题,摘引如下。

一、“布政记载”,有一件江宁藩司陶易的请安折“江宁布政使臣陶易跪请皇上圣躬万安”,姓名左边有朱批“竟胜此任,好的”。此请安折还附一箍,上写“布政记载乾隆四十一年”。<sup>④</sup>查乾隆四十一年三月,陶易由江南粮道升任江宁布政使。

二、“总兵记载”,有由一个箍箍住的一组请安折档案,箍上写“三十年南巡总兵记载”。内有四件请安折。其一是“山东登州总兵官奴才马之骥跪请皇上圣躬万安”,名字左边朱批“且将就而已,不甚满意”。其二是浙江黄岩镇总兵黄士俊的请安折,名字左边朱批“尚妥当,然只可此任而已,□老尚可”。其三是浙江温州镇总兵段秀林的请安折,名字左边朱批“妥当,亦可”。第四件是“福建漳州镇总兵官臣任澍跪请主万安”,名字左边朱批“有出息,好的”。<sup>⑤</sup>这里提到的三十年,显然是乾隆三十年,正是这一年,乾隆第四次南巡。在巡幸过程中,不仅沿途官员,甚至隔省官员都得亲自到驻蹕地接驾请安。马之骥等四名总兵正是在乾隆三十年皇帝南巡时召见,并将见面中的观感评价朱笔于请安折上,形成“总兵记载”。

这几件档案,依据其档案上所套的“布政记载”、“总兵记载”箍,都可以确定属于朱批记载档案。“道府记载”、“布政记载”、“总兵记载”都是朱批记载的一种。前引乾隆帝寄谕中自称“朕与总兵等之是否相宜一经召见,无不密记以备考核,文职道府以上亦然。”由此可知,武官总兵以上,文官道员知府以上,乾隆帝都会在召见时将简短评价朱笔密记,以备他日简用官员时参考。

朱批记载内容虽严格保密,但皇帝朱批记载的行为,有臣下是意识到的,在清人年谱中就有这样一例。嘉庆二十四年(1819)四月初一日,张大镛奉旨授山西河东道。四月初二日,张大镛具折谢恩请训,被嘉庆帝召见,结束之时,“臣即整冠出,方起立将退时,见上取臣折似有御笔标题之意,寸心惴惴,不知奏对有无错误。”<sup>⑥</sup>张大镛注意到的嘉庆帝“御笔标题之意”,确实存在,在宫中朱批档案中,我们查到了这件谢恩折,嘉庆帝对张大镛的评价是“似可”<sup>⑦</sup>。

① 江苏江宁府知府钱金殿《奏为蒙恩擢任江苏江宁府知府谢恩事》,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初八日,《朱批奏折》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,档号04-01-13-0052-028。

② 发往江苏候补知府钱金殿《奏为奉旨发往江苏候补知府谢恩事》,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,《朱批奏折》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,档号04-01-13-0067-034。

③ 安徽庐州府知府钱金殿《奏为奉旨回安徽庐州府知府任谢恩事》,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,《朱批奏折》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,档号04-01-13-0080-035。

④ 请安折档案,档号04-01-041-000078-0011。

⑤ 以上四件皆为请安折档案,档号为04-01-041-000078-0002、0003、0004、0005。

⑥ 张大镛《鹿樵自叙年谱稿》,道光刻本。

⑦ 山西河东道张大镛《奏为奉旨补授山西河东道谢恩事》,嘉庆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,《朱批奏折》,档号04-01-13-0217-025。

总的来说,朱批记载是以请安折等上奏文书为载体,是皇帝朱笔记录的对官员的简短主观评断,这一评断往往根据召见引见时观其体貌情态、听其言语论说、察其人品性格,或许加上官员履历、为官治绩等,经过综合考量得出,一般书写于官员衔名旁边。这些文书,可称为朱批记载档案。

## 二、官员召见引见与朱批记载

朱批记载,一般产生于皇帝召见引见官员之时。中下层官员引见时,皇帝也会予以简短评价,朱批记载,这在相关清宫履历档案中相当常见。戴逸注意到乾隆引见官员时会写有评语<sup>①</sup>,冯尔康等对清代履历档案及其中的皇帝朱笔评价问题(虽尚未称之为朱批记载)已有所研究<sup>②</sup>,本文对因引见而产生的朱批记载不再涉及。

清代皇帝大都勤政,召见大小官员,是其政务常态。顺治时,御史担任出京差使,皇帝必定会召见。顺治帝称“御史为朕耳目之司,所以察民疾苦及有司之贤不肖也。临差之时,必令陛见。朕将地方兴利除弊事宜,面谕遣之,使伊等得亲承戒谕,始能勤修职业。”<sup>③</sup>雍正帝之勤政,众所周知,据说“自即位以来,于文武大小臣工皆留意简选。而于伊等陛见之日,必召入面询,亲加训诲,欲其洁己奉公,勤修职业,谨守法度,爱养兵民,往往丁宁诰诫,至再至三。”<sup>④</sup>乾隆帝称“记名道府人员朱批记载,乃皇考世宗宪皇帝留意人材,以便随时录用,实属法良意美,所当永远遵守。”<sup>⑤</sup>由此看来,道府记载似始于雍正年间。当然,并不是召见官员,皇帝便会予以朱笔记载。高级官员如军机大臣、大学士、各部尚书侍郎、都察院都御史、副都御史等,各省总督巡抚、驻防都统将军等,皇帝比较熟悉(当然,新君即位时有例外),对其能力品行等,已有定论,就无需再施以朱笔记载。有些官员,官职未必很高,但皇帝也相当了解,即使召见,也未朱笔记载。归纳产生朱批记载的召见,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,一是内外文武大员抵京陛见请安,二是官员赴任请训,三是京官差使完竣回京复命,四是官员谢恩。

第一种情形是内外文武大员抵京陛见请安召见。乾隆帝即位不久,就下旨“朕因各省提督、总兵官未经识认者甚多,是以降旨令其酌量先后来京陛见。向来提镇到京皆赴部投文听候引见,但此例不行已久。督抚提镇同为封疆大吏,督抚既不赴部引见,则提镇到京亦准其即赴宫门请安,候朕宣召,不必先行赴部。”<sup>⑥</sup>乾隆帝为了加强对提督、总兵的识认了解,刚登基不久就要求他们陆续来京陛见,又以他们与督抚同为封疆大吏为由,允许他们到京不必先行赴兵部,再由兵部引见,而是径赴宫门请安,听候宣召。乾隆十四年(1749)、二十二年,皇帝先后将各省布政使、按察使,提督、总兵三年请旨陛见的制度规范化,并明确表示目的是为了召见他们“以别贤否”。<sup>⑦</sup>

除了三年任满陛见之外,对于盛京等各省将军、副都统等,每年俱各轮班陛见,盛京五部侍

① 戴逸《乾隆帝及其时代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2年,第160、161页。

② 见秦国经《清代官员履历引见折》(《历史档案》1986年第1期),黄十庆《清代的引见制度》(《历史档案》1988年第1期),冯尔康《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——以雍正朝为例》(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6年第4期),及王志明《雍正朝引见制度的若干问题》(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2年第5期)等论文。引见时的朱批记载,皇帝一般朱笔书写在官员引见折、履历上。

③ 嘉庆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770《都察院·各道·出差通例》。

④ 嘉庆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754《都察院·宪纲·谕旨》。

⑤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963,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乙亥。

⑥ 乾隆《大清会典则例》卷108《兵部·职方清吏司·公式三·绿旗》。

⑦ 嘉庆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53《吏部·汉员升补·藩臬奏请陛见》,乾隆《大清会典则例》卷104《兵部·职方清吏司·职制二》。

郎也每年轮流一人来京陛见，称为年班。<sup>①</sup> 更常见的是，清代文官布政使、按察使以上，武官提督、总兵，驻防将军、都统、副都统、某些城守尉等，担任新职时，不管是升任或改调，一般都奏请陛见。如果皇帝批准，当其抵京时，可自赴宫门递折请安，预备召见。此外，内外文武大员因终养完毕、服阙或病痊等事到京，亦同样赴宫门递折请安。一般皇帝都会予以召见，召对问答之间，加以评判，施以朱笔记载。

这在清人日记、年谱中常有记载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李星沅由河南粮盐道升授陕西按察使，上折谢恩请觐见，奉朱批“着来见”。李星沅于五月初六日到圆明园，初七日“寅正入大宫门递折，伺候召见”，并被宣召。<sup>②</sup> 此处虽未说明递的是什么折，按理自然是请安折。道光二十一年，李星沅由四川按察使改任江苏按察使，上折请觐获准，于九月二十九日抵京，十月初一日，“苏拉张路安赏绿头牌及请安折、履历片到寓，约明日丑正同递”。初二日，李星沅“丑正入东华门，寅正递折”，被道光帝召见。<sup>③</sup> 道光二十二年，官运亨通的李星沅由江苏布政使升授陕西巡抚，被允准觐见，于十二月初二日抵京。初三日，“丑正偕苏拉入景运门朝房，递请安折子……辰正入觐，约三刻始出”。<sup>④</sup> 咸丰七年，山西巡抚王庆云擢任四川总督，上折谢恩请觐，奉朱批“俟交卸抚篆，再行来见。”八月十九日，王庆云抵京赴圆明园，第二天就“递请安折……蒙召见于勤政殿之东书房”<sup>⑤</sup>。咸丰九年三月，新任浙江按察使段光清抵京，赴圆明园，“具折请安”，得到咸丰帝的召见。<sup>⑥</sup>

这类召见情形中的朱批记载一般出现在内外文武大员请安折档案中。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，原任四川重庆镇总兵乔冲杓，守制期满抵京，就“趋赴阙庭叩谢天恩恭请圣安”，被召见，朱批记载“人本分，妥当”。<sup>⑦</sup> 嘉庆十年，新授湖南布政使韩崧来京陛见，赴宫门上请安折，被召见，朱批记载是“竟可”。<sup>⑧</sup> 道光二年，新调江西按察使魏元烺来京觐见，经召见之后，请安折上的评价是“明白似可”。<sup>⑨</sup>

第二种情形是官员赴任请训召见。嘉庆帝亲政以后，“遇有谢恩请训知府，俱经召见”<sup>⑩</sup>。嘉庆十七年，皇帝下旨“嗣后在京大员出差，俱着于启程前一二日具折请训召见后，各按期前往。”<sup>⑪</sup> 因请训而召见的官员范围比陛见请安召见的要广，并不限于内外文武大员。清代文官知府以上，武官参将以上<sup>⑫</sup>，奉旨担任新职、大计卓异或俸满引见回任，赴任或回任之前，一般要上奏谢恩请训，伺候召见。皇帝一般会予以召见，并加以训诲，考察其人能否，予以朱批记载。

清人日记中有不少官员赴任请训召见的记载。如翁心存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简放江西学政，“次日谢恩，蒙召见养心殿西暖阁，训谕周諄，跪聆敬志，即日陛辞，屏当行李”<sup>⑬</sup>。同治

① 雍正《大清会典》卷114《兵部·武选司·驻防·驻防通例》。嘉庆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74《吏部·处分例·虚悬城守》。

② 《李星沅日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67页。

③ 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293页。

④ 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458页。

⑤ 王庆云《荆花馆日记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5年，第894页、902页。

⑥ 段光清《镜湖自撰年谱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138页。

⑦ 原任四川重庆镇总兵乔冲杓《奏为恭谢天恩叩请圣安事》，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6-0046-022。

⑧ 新授湖南布政使韩崧《奏为恭请圣安事》，嘉庆十年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30-0079-025。

⑨ 请安折档案，档案号04-01-042-000080-0009。

⑩ 嘉庆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64《吏部·处分例·外官甄别去留》。

⑪ 嘉庆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91《吏部·处分例·本章违误》。

⑫ 档案中也看到有更低级的武官如游击、守备等授职谢恩折件，唯其数量甚少，且以同光年间占大多数，应该不是常例。

⑬ 《翁心存日记》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，第77页。

九年六月二十五日，李兴锐奉旨“准其补授大名府知府，以道员用”，之前已托人代拟谢恩折，第二天有张姓苏拉送谢恩折、绿头牌来看过，六月二十六日，“上朝谢恩，预备召见”，不过，“在九卿朝房待至巳刻”，才有苏拉来通知“不叫起”，即不召见。<sup>①</sup>

清代档案中，官员赴任上请训折召见并被朱批记载的相当多，尤其是道员、知府，数量相当庞大。乾隆二十三年，贵州按察使徐以升，奏报赴贵州按察使任起程日期并请训，被召见，朱批记载“此人似有可望，但恐圆融些”。<sup>②</sup>道光六年（1826）十二月二十日，任职六年俸满引见，奉旨回任的直隶永定河道张泰运，上折谢恩并请训，道光帝予以召见，评价为“老练”。<sup>③</sup>咸丰元年（1851）十月初五日，吏部带领引见后奉旨补授河南陈州府知府的朱师廉，上折谢恩并吁求恩训，被召见，朱批记载为“似可，老成”。<sup>④</sup>

第三种情形是京官差使完竣回京复命召见。清代京官较重要的外差完竣，抵京之后，即应迅速上复命折，亲赴宫门等候召见。如学政三年任满，各省乡试考官监试完毕，或科道等官员查勘完事等等。皇帝召对时，问讯差务情况，外省情形，皇帝据此加以评判，朱批记载。

道光九年，翁心存广东学政任满回京，于二月初八日入京，因病耽搁了两天，于二月十一日“复命，召对勤政殿东暖阁，奏对良久”<sup>⑤</sup>。道光十四年，翁心存交卸江西学政回京，于十二月十五日入城，第二天“寅初三刻递折，卯正之交召见养心殿西暖阁，奏对良久乃退”<sup>⑥</sup>。翁心存所递之折，自然是复命折。翁心存算是差满召见奏对称旨的，也有表现不好的。乾隆十三年，给事中同宁、马宏琦，御史沈延芳、赵青藜由山东查勘赈务回京复命，乾隆帝“召见询以东省情形，所查察之处地方官办理孰为周到，孰为实心，竟未能一一举陈……屡询漫无以应”，下旨严行申饬。<sup>⑦</sup>同宁等的召对表现如此不堪，乾隆帝如果朱批记载的话，肯定评价很差。

此种召见情形的朱批记载一般在京官复命折中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八月初一日，巡视天津漕务御史孟邵奏称“业将南漕全数催过津关”，赶赴行在“恭复恩命”，得到皇帝召见，朱批记载“中材，不糊涂”。<sup>⑧</sup>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，陕西乡试正考官蒋攸铻、副考官钱开仕事竣回京，“赶赴宫门恭复恩命”，得到乾隆帝召见，蒋攸铻的朱批记载为“似有出息”，钱开仕的为“陈群之孙，亦可，慢看”。<sup>⑨</sup>嘉庆七（1802）年正月二十七日，广西学政钱楷卸任到京，“赶赴宫门恭复恩命”，被嘉庆皇帝召见，朱批记载“明白”<sup>⑩</sup>。

第四种情形是官员谢恩召见。清代官员，不论是升迁调补，或者赏赐加恩，甚至降休斥革，所谓“雷霆雨露，莫非天恩”，都须谢恩。当然，官员赴任请训，也多包含谢恩之意，外差任满复命，亦何尝不恭谢派差恩典，不过毕竟以请训、复命为主。此处主要是指谢恩为主的，包括京

① 《李兴锐日记》，中华书局，2015年，第31页。

② 贵州按察使徐以升《奏报赴贵州按察使任起程日期并请训事》，乾隆二十三年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：04-01-12-0092-071。

③ 直隶永定河道张泰运《奏为六年俸满引见奉旨回任谢恩事》，道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：04-01-13-0236-031。

④ 新选河南陈州府知府朱师廉《奏为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补授河南陈州府知府谢恩并吁求恩训事》，咸丰元年十月初五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号04-01-12-0479-105。

⑤ 《翁心存日记》，第76页。

⑥ 《翁心存日记》，第115页。

⑦ 嘉庆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770《都察院·各道·出差通例》。

⑧ 巡视天津漕务监察御史孟邵《奏为差竣由天津赶赴行在复命事》，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一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3-0055-001。

⑨ 陕西正考官蒋攸铻等《奏为典试陕西事竣回京复命事》，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38-0103-038。按，陈群，即钱陈群。

⑩ 广西学政钱楷《奏为广西学政任满交卸起程返京谢恩复命事》，嘉庆七年正月二十七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3-0138-006。

官和因候选或其他缘由在京的外官的谢恩情形。

谢恩一般上谢恩折，“在京各大员，凡系加恩升补，其应行递折谢恩豫备召见者”<sup>①</sup>，也有不上折的，只是在御驾经过时道旁叩头，或赴宫门叩头。官员谢恩，皇帝并不必定召见，“在京补放人员，往往有具折谢恩不即召见，或隔至数日始行召见者”<sup>②</sup>，召见与否皆属正常。不过，如果是道府以上外官谢恩，因有关地方吏治，皇帝一般会予以召见。

官员谢恩召见情形在清人日记年谱中也屡有记载。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五月十五日，王庆云奉上谕补授翰林院侍讲学士，“急回寓缮折”，所缮当然是谢恩折。第二天，王庆云到圆明园，“寅初二刻宫门辟，遂入递折，还至朝房小憩。卯初三刻复入，候旨于出入贤良门东之朝房。卯正传出召见第六起……甫交辰初，宣入勤政殿赐见”<sup>③</sup>。又如咸丰八年（1858）正月，崇实奉旨补授太仆寺少卿，次日即具折谢恩，“蒙召见于勤政殿之东暖室”<sup>④</sup>。

含有朱批记载的谢恩折档案所存亦多。雍正年间，杜滨、殷式训、方覲授任监察御史，三人上折谢恩，被召见，杜滨的朱批记载是“明白精彩人”，殷式训的是“工部主事升，人老实，□些”，方覲的是“人明白，口谈好，瘦，少年”。<sup>⑤</sup>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五月十六日，茅元铭奉旨担任广东乡试正考官。五月十七日，茅元铭上折谢恩“所有微臣感激下悃，理合缮折恭谢天恩”，得到乾隆帝的召见，并朱批记载“人竟可，学问好”。<sup>⑥</sup>嘉庆三年，宋兆奎由禀贡生遵川楚善后筹备事例捐纳道员，于嘉庆七年三月分签选江西盐法道，由吏部带领引见，奉旨依拟用。四月初五日，宋兆奎上谢恩折，被召见，朱批记载“平常庸陋”。<sup>⑦</sup>

以上四种召见情形，皇帝分别于请安折、请训折、复命折、谢恩折中，依据对官员的观感，参酌考虑，朱批下简要评断语，形成朱批记载。清代皇帝中，雍、乾、嘉、道、咸五帝的朱批记载非常多，但同治、光绪二帝幼年即位，其朱批记载，即使是亲政以后，也暂未看到。各帝的朱批记载，满文、汉文均有，数量都相当庞大。

### 三、朱批记载的管理运用

朱批记载是皇帝对官员的评价，在清代中高级官员的铨选过程中，皇帝的意见最具决定性，因而，朱批记载往往可以决定官员的仕途。因此，前引的山西河东道张大镛召见结束时注意到嘉庆帝将要朱批记载，才会“寸心惴惴”，紧张不已。

乾隆帝召见总兵三德、裴慎后，朱批记载的大致内容是尚可胜任总兵之任。对于知府穆克登泰、钱金殿，乾隆帝的朱批记载评价一般，再查阅二人以前记载得到验证。此后，穆克登泰、钱金殿皆未再升用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乾隆帝对江宁布政使陶易的朱批记载是“竟胜此任，好的”，评价不错。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十日，时任江宁知府的陶易俸满引见奉旨回任，上谢恩

① 嘉庆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458《兵部·仪式·仪饰》。

② 嘉庆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501《兵部·绿营处分例·仪制》。

③ 王庆云《荆花馆日记》，第43页。

④ 崇实《惕齋年谱》，光绪刻本。

⑤ 山西道试监察御史杜滨等《奏为奉旨补授御史谢恩事》，雍正朝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30-0046-036。

⑥ 广东正考官茅元铭《奏为遵旨充任广东正考官谢恩事》，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七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38-0096-040。

⑦ 新选江西盐法道宋兆奎《奏为签选江西盐法道谢恩事》，嘉庆七年四月初五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3-0138-021。

折，乾隆朱批“此人可出息，道即可，尚未量”<sup>①</sup>，认为陶易能有出息，可以马上擢用道员，且未可限量。果然，陶易即从知府升道员，又升布政使，后续仕途看好，不过，陶易最终在江宁布政使任上牵涉到徐述夔文字狱案，因“意存徇纵”，被判斩监候，秋后处决<sup>②</sup>。在总兵记载的四人中，对于登州总兵马之骥、黄岩镇总兵黄士俊，乾隆帝的评价都不高，两人后来都在任上因病解任<sup>③</sup>。此前，黄士俊由云南督标中军副将奉旨简放云南补用总兵官，上折请训，乾隆朱批“乍看似不满意，细看却去得。亦出过力，总兵竟可，故云人不可貌相也”<sup>④</sup>。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五日，黄士俊调任永州镇总兵上折请训，乾隆朱批“尚可将就”<sup>⑤</sup>。对于温州镇总兵段秀林，乾隆的朱批记载是“妥当”，很快，段秀林就升任浙江提督<sup>⑥</sup>，后来转任多处提督。至于漳州镇总兵官任澍，乾隆皇帝评价最高，不过很快他就在任上去世，被“祭葬如例”<sup>⑦</sup>。此前任澍奉旨补授泰宁镇总兵上折请训，乾隆朱批“聪明妥当人”<sup>⑧</sup>。总之，乾隆皇帝的朱批记载与穆克登泰等几位文武官员的仕途，除了江苏布政使陶易牵扯到所谓“文字逆案”的特殊情形，相关性都是相当强的。朱批记载评价中等者，就止于任上，评价高者，就仕途更上一层。

皇帝对官员的朱批记载往往不止一次，随着官员的仕途变迁、被召见次数的增加，皇帝对该官员的朱批记载就更多了。以下再以有关乾嘉名儒翁方纲的多次朱批记载为例，对朱批记载档案本身特征进行仔细描述分析，并探讨朱批记载的管理运用。

乾隆二十四年十月，江西乡试副考官翁方纲完事到京，上复命折，获召见于养心殿西暖阁<sup>⑨</sup>。翁方纲名边上朱批“似有心，可慢试用，平。”奏折天头贴两黄签，分别为“已放詹事府詹事，江西学政”，“翁方纲，直隶人”。<sup>⑩</sup>翁方纲任詹事在乾隆四十九年，又于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奉旨提督江西学政，且黄签上“江西学政”四字，与“已放詹事府詹事”七字明显字迹疏淡有别，表明“已放詹事府詹事”黄签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后贴写，并且在五十一年九月之后又加“江西学政”四字，这距离翁方纲上折、乾隆朱批之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。

乾隆二十七年十月，湖北乡试正考官翁方纲、副考官彭冠监试完毕回京，上复命折，获召见于香山致远斋<sup>⑪</sup>。在翁方纲、彭冠衔名旁边，皇帝朱批“二人科分皆新，学政且未宜即用。”翁方纲名边上批“亦妥当，再看”，彭冠名边上批“柎葵之子，较胜其父明白些”。奏折天头部分还贴了四条黄签，自右至左分别为“翁方纲，已放内阁学士，广东学政，降授编修”，“彭冠，已放侍讲，丁忧”，“翁方纲，直隶人”，“彭冠，河南人”。<sup>⑫</sup>“彭冠，已放侍讲，丁忧”一句，其中的“丁忧”二字写在另一黄签上，与“彭冠，已放侍讲”接粘。表明此折上黄签内容，亦

① 江苏江宁府知府陶易《奏为奉旨回任谢恩事》，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十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30-0051-040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069，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乙亥。

③ 军机处上谕档，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4条。《清高宗实录》卷801，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癸未。

④ 特放云南补用总兵黄士俊《奏报起程赴滇日期并请圣训事》，乾隆朝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7-0027-075。

⑤ 湖南永州镇总兵黄士俊《奏为恭诣行在恭请圣训事》，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五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6-0041-026。

⑥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798，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辛卯。

⑦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798，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辛卯。

⑧ 直隶泰宁总兵任澍《奏为赴任请圣训事》，乾隆朝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7-0027-066。

⑨ 沈津《翁方纲年谱》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，2002年，第21页。

⑩ 江西副考官翁方纲《奏为奉试江西事竣到京复命事》，乾隆二十四年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38-0072-048。

⑪ 沈津《翁方纲年谱》，第24页。

⑫ 湖北正考官翁方纲《奏报奉命典湖北乡试事竣到京日期事》，乾隆三十五年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2-0140-086。

分多次粘贴书写。查翁方纲于乾隆二十九年七月出任广东学政（符合乾隆“未宜即用”学政的要求），三十六年因故降职改授编修，五十四年，擢任内阁学士。这也表明折上有关二人任职情况的黄签已是多年以后所粘了。

乾隆二十九年七月，翁方纲奉旨担任广东学政，上谢恩折，被召见，“奏对良久”<sup>①</sup>。折上翁方纲名边上朱批“似有出息，此任可”。<sup>②</sup>

乾隆四十四年十月，江南乡试正、副考官谢墉、翁方纲监考完毕回京，上宫门复命折，“召对于养心殿西暖阁”<sup>③</sup>。他们的名字旁边批“皆可授”，奏折天头部分有黄签四，自右往左分别为“谢墉，已放吏部左侍郎，江南正考官”，“翁方纲，已放洗马”，“谢墉，浙江人”，“翁方纲，顺天人”。<sup>④</sup>此折谢墉以江南乡试正考官职复命，黄签上写其“已放吏部左侍郎，江南正考官”，肯定不是指此次。查翁方纲任洗马，是在乾隆四十六年。乾隆四十七年五月，谢墉转吏部左侍郎<sup>⑤</sup>，四十八年六月，谢墉再任江南乡试正考官。且“江南正考官”五字写在另一签条上，与“谢墉，已放吏部左侍郎”接粘。所以折上黄签亦有多次贴写。

乾隆五十一年九月，翁方纲新授江西学政，赴热河上谢恩折，“召见于澹泊敬诚行殿”<sup>⑥</sup>。名字旁边批“学问好，人亦可”，折上天头有黄签“顺天人”。<sup>⑦</sup>

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，翁方纲任江西学政三年期满回京，上宫门复命折，“召见于养心殿西暖阁”<sup>⑧</sup>。名字旁边批“学问好，亦可”。<sup>⑨</sup>

此外还有一件时间不详的翁氏请安折，上写“臣翁方纲恭请皇上圣躬万安”，名字旁边批“中等文人而已”。<sup>⑩</sup>此折应在乾隆五十八年翁方纲卸任山东学政赴热河请安时所上（乾隆帝此时正在热河）<sup>⑪</sup>。这表明，乾隆帝对翁方纲的最终评价一般。

从历次朱批记载的用语来看，乾隆对翁方纲的认识与评价有一个渐进的过程。乾隆二十四年，对翁方纲的评价是“似有心，可慢试用”，乾隆二十七年是“亦妥当，再看”，乾隆二十九年，是“似有出息”，用的或是疑似之词，或者表示还需考察。到了后期，乾隆对翁方纲的评价已经基本定性，主要是认为他“学问好”，人也还行，但只是“中等文人”。清人笔记也反映乾隆对翁方纲并不是非常看重。据记载“朱珪……纯皇帝深重其品。刘文正公复荐于朝，曰‘北

① 沈津 《翁方纲年谱》，第 29 页。

②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翁方纲 《奏为奉旨补授广东学政谢恩事》，乾隆二十九年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 04-01-13-0445-038。

③ 沈津 《翁方纲年谱》，第 139 页。

④ 江南正考官谢墉等 《奏报奉命典试江南事竣起程及到京日期事》，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十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 04-01-12-0183-035。

⑤ 军机处上谕档，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二日第 2 条。

⑥ 沈津 《翁方纲年谱》，第 236 页。

⑦ 詹事翁方纲 《奏为奉旨新授江西学政谢恩事》，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十一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 04-01-13-0078-034。

⑧ 沈津 《翁方纲年谱》，第 269 页。

⑨ 詹事翁方纲 《奏报江西学政任满交卸印务起程及到京日期事》，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 04-01-13-0082-001。

⑩ 请安折档案，档案号 04-01-042-001866-0009。

⑪ 翁方纲在历次担任考官或江西学政回京时都上复命折被召见，此次因请安而被召见，比较大的可能是在翁方纲广东学政或山东学政卸任回京之时。但乾隆三十六年翁方纲在广东学政任上是被降三级调用，已无资格在抵京时具折请安，《翁方纲年谱》于其抵京也未记载说被召见。翁方纲在山东学政任上，因不能约束家人奉旨回京供职，含撤任之意，因非正常年满交代，似不应上复命折，而是以请安折代替。此时翁方纲仍是礼部侍郎兼内阁学士，有上请安折的资格。因乾隆帝此时正在热河，翁方纲就赴热河请安，被召见（《翁方纲年谱》，第 319 页）。

直之士多推鲁少文，而珪、筠兄弟与纪昀、翁方纲等皆学问渊博，实应昌期而生者。’上曰，‘纪、翁文士未足与数，朱珪不惟文好，品亦端方。’<sup>①</sup>由此可见，乾隆认为，翁方纲或许能算学问渊博的文士，但品格并不突出，配不上“应昌期而生者”之语。

考察翁方纲的仕宦生涯，并不平坦。翁方纲少年得志，年少即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，散馆授编修，很快即得考差，放学政。乾隆三十六年，时任翰林侍读学士提督广东学政的翁方纲，因听任乡试士子滥开年貌，未加确核，被交部严加议处，部议降三级调用，后被授为翰林院编修，回到原点。这是翁方纲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挫折。之后，翁方纲好不容易于乾隆五十四年，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达到仕宦生涯的最高点。但是，乾隆五十七年，担任山东学政的翁方纲因被参以不能约束家人，第二年被革去山东学政回京供职。乾隆六十年京察，翁方纲仍因在山东学政任内不能约束家人，加以“近看其和诗，学问亦属平常”，被交部议处。于是降补内阁侍读学士，仍带降二级从宽留任。这是翁方纲仕途的第二次严重挫折。四年之后，嘉庆皇帝当政，翁方纲升任鸿胪寺卿，但是这闲曹京堂也未能保住，嘉庆六年，“年已衰老”的翁方纲被派去裕陵（乾隆帝陵）守墓，直到嘉庆九年，才被放回致仕。<sup>②</sup>

由乾隆帝对翁方纲的朱批记载，结合其仕宦履历来，还是比较符合的。乾隆帝对翁方纲，重其学而不甚重其人，任职一有差池，即予相应降罚，又需从头一步一步升迁，这样，翁方纲宦途两蹶之后，就只能老于中级官僚了。

从有关翁方纲的朱笔记载档案来看，朱批记载会得到的专门保管和整理，这在其他朱批记载档案中也得到验证。召见之前，官员折件可能会被贴上含籍贯等信息的黄签，以供皇帝参考。比如，嘉庆元年正月二十九日，贵州学政洪亮吉任满交卸抵京，赴宫门递复命折，折上衔名右边贴一黄签，上写“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内召见明白边再看”，衔名左边则朱批记载“似可”。<sup>③</sup>折上黄签所记，是乾隆五十七年洪亮吉被授予贵州学政，上谢恩折时被召见的朱批记载<sup>④</sup>，粘贴上折以供乾隆帝召见时参阅。召见之后，如有需要，朱批记载就被提取出来查证。而且，相关人员（太监）还不时补充后续任职情况等信息粘贴黄签于折件上，有的还不只一次，甚至在时隔多年以后仍然补充信息。

总之，朱批记载有太监专人负责管理，将朱批记载档案箍上归档，相对集中存放。在朱批记载形成前后，保管太监会时常加以整理，补充官员籍贯，任职情形等相关信息，甚至摘抄汇录，方便查询查考。当皇帝需要参考以前的评价时，专管太监就将该官员的朱批记载查找出来，用以验证。朱批记载的密记、保管、调用，都是相当保密的，只有皇帝及相关保管太监知道。朱批记载的折件，不仅不发抄，而且也不下发军机处，所以军机大臣对其内容也并不知晓。

#### 四、小结

在清代，不仅皇帝会在召见引见臣僚时加以评价并朱笔记载，高级官员们会见下属时也可能采取类似措施。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王庆云任顺天府尹，“日来外州县同官多来见者。每令即回

① 昭槿《啸亭杂录》卷4《朱文正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第103页。

② 以上翁方纲仕宦生涯，综合《清史列传》、《清高宗实录》。见《清史列传》卷68《翁方纲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5459页。《清高宗实录》卷894，乾隆三十六年十月戊辰；卷1431，乾隆五十八年六月甲申；卷1470，乾隆六十年二月庚申。

③ 贵州学政洪亮吉《奏为交卸学政进京复命事》，嘉庆元年正月二十九日，《朱批奏折》，档案号04-01-13-0110-027。此时虽已传位于嘉庆帝，但仍主要是乾隆帝在召见官员。

④ 此折亦在宫中朱批奏折档案中查到，翰林院编修洪亮吉《奏为奉旨新授贵州学政谢恩事》，乾隆五十七年，档案号04-01-13-0102-015。唯折上老年乾隆帝的朱批“明白边再看”中的“边”字字迹浅淡，几不可识。

本任，因另册记其履历，略加评语三两字”<sup>①</sup>。据说恭亲王奕訢主政时也有类似举措 “恭王当国时，京官自五品以上，外官自司道以上，恭王自书名册一本，每人增注考语于下，用人时凭册支配，举措一时称最。”<sup>②</sup>

清代朱批记载包括道府记载、总兵记载、布政记载等等，是皇帝对官员的简要的主观评价。朱批记载往往产生于皇帝召见引见官员之时，以请安折等上奏文书为载体，由皇帝根据面见时官员的体貌情态、言语论说，参考官员履历、为官治绩等，经过综合考量得出。朱批记载一般由太监专人保管整理，严格保密，连军机大臣等近臣对朱批记载内容亦不得而知。需要之时，皇帝便调出该官员的朱批记载，予以验证参考。朱批记载既反映了清代皇帝之勤政，更是皇权专制在人事任用方面的体现。朱批记载的实质在于面见召对，皇帝亲自召见引见官员，问讯质难，以见其人之才能品格，作为用人参考，乾纲独断，不假手于他人。不过，皇帝以召见引见确保用人权在握，但用人效果则难以保证。中国古代评价官员有“身言书判”四大范畴，仅仅面见，正如王庆云所说“人不易知，身言只得其半耳”。精明强干如乾隆帝，也难以保证完全知人善用。

由于皇帝对中高级官员的选用有着绝对的主导权，朱批记载对官员的仕途升迁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。除了清宫履历档案外，在现存清代宫中汉文朱批奏折、请安折，以及满文朱批奏折、杂件等档案中，有着不少的官员朱批记载，粗略估计，总数达到几千件<sup>③</sup>，值得我们大力发掘，从而推动清代重要人物的研究。

(论文写完投出后，在与本馆满文专家李刚交流时，承蒙惠赐其未刊论文《清宫“朱批记载”档案浅探》，该文从满文档案入手，亦关注到朱批记载档案问题，可谓殊途同归。通过该文，笔者了解到满文档案中的朱批记载档案情况，拙文得以完善，在此深致谢忱。)

---

① 王庆云 《荆花馆日记》，第216页。

② 刘声木 《苍楚斋随笔 续笔 三笔 四笔 五笔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755页。

③ 承李刚惠告，满文档案中的朱批记载档案就有两千多件。